

戏曲研究丛书

晋商、移民与戏曲



张春娟 著

张春娟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晋商、移民与戏曲 / 张春娟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068-6759-7

I . ①晋… II . ①张… III . ①戏曲史—研究—山西—明清时代

IV . ① J8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9662 号

晋商、移民与戏曲

张春娟 著

---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戎 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759-7

定 价 58.00 元

---

本书系第 6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中国歌剧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2017M611524）阶段性成果。

## 中文摘要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境内有五十多个戏曲剧种；在人口流动方面，山西在明清时期有两次影响比较大的事件，一是明初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另一个是驰名中外的明清晋商；那么，这么影响大的两次事件是否都与明清的山西戏曲有些关联呢？于是，本书大胆地引入移民的视角，想以明清晋商和移民的视角来探讨山西戏曲在明清时代发展繁盛的原因以及传播流布的轨迹。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明清晋商、移民与戏曲传播的关系。明清的晋商与移民不仅为山西戏曲的对外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语言基础，而且成为明清时期戏曲传播的重要途径。依靠这两种途径，不仅风行全国的昆山腔与弋阳腔得以传入山西地区，而且山西的地方戏曲也凭借这两种途径传向了全国各地。

第二章，详细论述了明清晋商、移民与戏曲班社的关系。不仅用甘肃乐善堡戏班的实例证明了明初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中确实包含有山西戏班以及艺人，而且还用诸多的实例证明了出现于明清时期的商业移民确实促进了山西戏班的对外传播与发展。另外，本章还专设一节，详细论述晋中商人与晋剧班社的关系：富甲一方的晋商在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之后，不仅不惜重金、投资组建山西戏班，而且投资兴办了山西戏曲科班以及广泛组建票社，他们为山西戏曲班社的建立、发展与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第三章，详细论述了明清晋商、移民与戏曲艺人的关系。他们三者不仅有着共同的特征——流动性与思乡情，而且他们三者经常处于角色互换的状态：不仅不少晋商由于爱好戏曲而走上了弃商从艺的道路，也有不少戏曲艺人在积累到一定资财后走上了弃艺从商的道路，他们都为山西戏曲的对外传播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四章，详细论述了明清晋商、移民与戏曲舞台的关系。不仅论述了寓居外地的晋商与会馆戏台，而且论述了祖居山西的晋商与宅院戏台；另外，本章专设一节，探讨了遍布全国的关帝庙戏台；这些戏台不仅为我国的戏曲艺术研究留下了许多活的宝贵资料，也为我国的建筑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第五章，详细论述了明清晋商、移民与戏曲剧目的关系。这些众多的戏曲剧目不仅反映了晋商与移民的真实历史与思想感情，而且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诉求。在这些丰富的戏曲剧目中，不仅出现了众多反映晋商的戏曲剧目，也出现了一些反映移民历史与移民背景的戏曲剧目，通过对这些剧目的研究，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与晋商崛起的历史风云。此外，由于关羽是山西解州人，而明清之际的晋商、移民与戏曲艺人又都把关羽作为自己的乡土神与保护神，所以本章专列一节，详细探讨“关戏”剧目的题材来源、发展演变与演出禁忌，从而对“关戏”剧目与关戏演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此外，笔者还多次深入山西省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以及山西省祁县贾令镇谷恋村，调查采访当地的民间艺人，了解当时的戏曲生存状况，也为本书的论述找到一些具体的实例进行论证。山西戏曲过去的辉煌带给了我们今天太多的思考，关于如何在当今时代改革与发展戏曲艺术，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 目 录

## 绪 论

|               |     |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002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 004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009 |

## 第一章 晋商、移民与戏曲传播

|                      |     |
|----------------------|-----|
| 第一节 晋商、移民与戏曲传播的关系    | 012 |
| 第二节 明清外来戏曲声腔的晋内传播考   | 031 |
| 第三节 明清山西戏曲向外传播考      | 055 |
| 小结：明清晋商与移民对戏曲传播的重要作用 | 069 |

## 第二章 晋商、移民与戏曲班社

|                  |     |
|------------------|-----|
| 第一节 洪洞大槐树移民与戏曲班社 | 075 |
| 第二节 商业移民与戏曲班社关系考 | 092 |
| 第三节 活跃在“晋外”的山西戏班 | 100 |
| 第四节 晋中商人与晋剧班社    | 111 |
| 小 结              | 132 |

|                    |     |
|--------------------|-----|
| 附：山西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戏曲调查考 | 133 |
|--------------------|-----|

### 第三章 晋商、移民与戏曲艺人

|                   |     |
|-------------------|-----|
| 第一节 晋商、移民与戏曲艺人的关系 | 141 |
| 第二节 弃商从艺的山西戏曲艺人   | 150 |
| 第三节 移居内蒙古的山西戏曲艺人  | 159 |
| 第四节 移居北京的山西梆子戏艺人  | 166 |
| 小结：艺人迁徙对戏曲艺术的重要影响 | 174 |

### 第四章 晋商、移民与戏曲舞台

|                  |     |
|------------------|-----|
| 第一节 移居外地的晋商与会馆戏楼 | 181 |
| 第二节 祖居山西的晋商与私宅戏台 | 199 |
| 第三节 遍布全国的关帝庙戏台   | 208 |
| 小 结              | 225 |
| 附：晋商会馆的由来与特征考    | 227 |

### 第五章 晋商、移民与戏曲剧目

|                   |     |
|-------------------|-----|
| 第一节 晋商、移民与戏曲剧目的关系 | 239 |
| 第二节 反映晋商的戏曲剧目     | 246 |
| 第三节 移民与戏曲剧目       | 254 |
| 第四节 关戏剧目          | 266 |
| 小 结               | 274 |
| 附：祁县谷恋村实地调查考      | 276 |

|     |     |
|-----|-----|
| 结束语 | 288 |
|-----|-----|

|      |     |
|------|-----|
| 参考文献 | 294 |
|------|-----|

|     |     |
|-----|-----|
| 后 记 | 302 |
|-----|-----|

## 绪 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晋商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特殊移民群体，驰骋商场500多年，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在明清时期，全国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影响这么大的两次事件均发生在明清时期，而且均与山西有关，况且山西又是一个戏曲大省，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梆子戏，曾随着晋商的足迹传遍了中国的大半部分。那么，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些联系呢？晋商何以能在明清时期成为当时国内实力最大的商帮，除一些客观因素之外，是否也与明初移民有一些关系？换句话说，明初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是否也是晋商崛起的客观因素之一？另外，晋商与移民有着共同的特征：流动性、思乡情，这种客观的流动性与主观的思乡情是否能够带动山西戏曲向外流动与传播呢？也就是说，晋商与移民是否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对外传播与衍变？这许许多多的疑问，促使我开始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于是我有了这种大胆的想法，想以“晋商、移民与戏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曾经有人说过：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可见山西商人数量之多。历史上所谓的“晋商”，特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因为这一时期的商人与明以前的商人有诸多不同：首先，明清晋商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商帮，居全国“十大商帮”——晋商、徽商、齐鲁商、江右商、洞庭商、宁

波商、龙游商、闽商、粤商、陕商之首。其次，晋商活动时间最长，从明初至民国早期，前后达五个世纪，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再次，晋商的活动地域很广，东渡大海，前往朝鲜、日本等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西到云南、贵州、打箭炉；西北到达塔尔巴哈台、伊犁；东北到黑龙江；北到蒙古，直达俄国彼得堡、莫斯科。最后，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创立了足以影响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票号业。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晋商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作为特殊的移民群体，他们所到之处，兴建会馆、组织戏班，对山西戏曲的向外传播与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山西历史上还发生了规模巨大的移民事件，“移民”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最初是作为动词使用，指广泛意义上的“迁移人口”。而本书所涉的“移民”，主要指明清时期，从山西迁往别处，并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如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从山西外迁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明清时期的商业移民以及随着商路迁往外地的戏曲艺人等不同类型的移民。这些移民是否把家乡的戏曲从山西带往别处？他们是以什么途径带出去？带出去的山西戏曲是否随着语言、风俗的变化会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方向又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特殊的移民群体对山西戏曲的推广和传播起了哪些重要作用？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

因而，本书着重以兴起于明代初年、衰落于辛亥革命以后，称雄中国商界达五百年之久的晋商以及明清山西移民为研究视角，着重论述明清晋商以及移民对山西戏曲的传播与影响。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国内对晋商研究首开先河的是清人李宏龄和李燧，李宏龄著有《同舟忠告》与《山西票商成败记》，《同舟忠告》是李宏龄在主持北京、上海、汉口商务期间，即光绪十六年至民国元年（1890—1912）写给总号经理们的76封信件的汇总。《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有一部分是李宏龄倡议各票号联合改组大银行所形成的文件与信函，反映了李宏龄是山西票号卓有远见的改革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燧著有《晋游日记》，作者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山西学政幕僚后，游历了祁县、平遥、介休、汾州等48个府州县城，写下了近四万言的日记，对各地工商业贸易情况，予以逐次描述。然而，这三部著作仅以记载与实录为主，尚不具有明显的研究体例。从20世纪20年代票号衰落之后，时人开始对晋商的兴衰进行专门的探讨。陈其田撰写的《山西票庄考略》是第一部研究晋商的专著，此后，卫聚贤撰写了《山西票号史》，两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都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探索，尚没有把晋商与山西戏曲联系起来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晋商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拓宽了学科视野，而且集中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但大多是从经济学角度对晋商进行深入探讨，如1995年山西大学经济系主任刘建生撰写的《山西近代经济史》，书中的很多篇章从经济学方面介绍了晋商的兴衰，再如张全盛的《研究晋商应立足于世界经济大市场的高度》与黄鉴辉的《从商品经济中

考察山西票号的起源》，也都是从经济学角度对晋商进行深入研究。迄今为止，从文化学角度，尤其是从戏曲文化学角度对晋商进行探讨者，尚不多见。专著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为代表，数量不多，但散见于各种杂刊的文章很多，而且有许多文章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观点。如郭士星的《论晋商对山西戏曲文化的贡献》（发表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版），认为晋商的强盛与山西戏曲的繁荣几乎是同一个时期，说明山西戏曲的繁荣与晋商的强盛之间有一种十分紧密的必然联系。文中从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晋商对山西戏曲所做的支持与贡献。沈琨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话说晋商与山西梆子戏》（载于《黄河》，2000年第6期），文中指出了由晋商带动的山西梆子戏，染得“北方梆子一片红”：从晋南蒲州梆子起家，一路北上，有了山西的中路梆子、北路梆子，进而又衍生出口梆子、京梆子（即后来的河北梆子），而上党梆子则从太行山东进，衍生出山东的枣梆、河北的“西调”。刘建生、武芳梅的《论晋商与山西戏曲的关系》（发表于《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月），认为晋商不仅促进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对戏曲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促进了戏曲的发展与繁荣。同时戏曲的繁荣也进一步推动了晋商的发展与强盛。孙桂芸的《晋商与山西戏曲艺术的传播》（发表于2008年《沧桑》第1期），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晋商不仅推动了山西以四大梆子为代表的戏曲演出，并且对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剧种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促成了明清及近代戏曲艺术的繁荣。柴国珍的《明清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影响》（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5月），文中认为明清晋商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资兴建戏班和票社，培养了众多本土戏曲艺术人才，热心探索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各种商贸活动以及搭建会馆把山西的戏曲艺术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吸收外来的戏曲艺术营养，促使了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丁双双、魏子任的《明清晋商与山西戏曲》，认为商路即戏路，由于晋商对家

乡戏的钟爱，随着商路的拓展，山西戏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渐走出三晋，传及全国，从而在清朝后期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

国外对晋商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学者。20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内日直作、里井彦七郎、山脉悌二郎等人在关于日本华侨社会、清代矿业资本以及清代盐商和长崎贸易等的论文中，多次引用山西商人的例证。进入60年代后，佐伯富对山西商人进行了系列研究，他从1968年3月起先后撰写了《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清代塞外的山西商人》《清代商人与内蒙古》《清代山西商人》《山西商人起源与沿革》《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等作品。同时，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于1972年11月由东洋史研究会刊行，接着他又写了《山西票号札记》等论文。70年代以来日本研究晋商的文论还有松浦章的《山西商人范毓黻一族的系谱和事迹》和《苏州的全晋会馆》《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山西商人张居正》等。但以上研究成果仅《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一文于1983年由张正明等译刊以外，其余均未在国内正式译刊。另外，日本学者很注意家系谱牒的整理与研究，但以晋商研究为视角，来探索中国戏曲发展的论文，在国外并未多见。

西方国家的学者专门研究晋商的极少，如何认识晋商这个区域经济现象，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值得参阅。如Anselin.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Research Paper 9331). Morgantown, WV: Reg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94。该文从区域空间联合的角度对区位指标进行了研究。再如: Maigus Berliant and Thus Ten Raa. A Foundation of Location Theory: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Dimand[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8: 44, 336 ~ 353。该文从消费者的角度，论述了区位理论。这些理论对认识晋商商贸活动形成的区域及其扩展机制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内最早从事中国移民研究的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

早在1930年,谭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求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移民史要》。1932年6月,谭先生从燕京大学顾颉刚先生门下研究生毕业,他在燕大《史学年报》上发表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稍后又发表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粤东初民考》等断代和区域移民史论文。80年代以后,谭其骧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为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主要阵地。1993年,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合作出版了《简明中国移民史》,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六卷本的《中国移民史》,该书于199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前,沈益民、童秉珠合著的《中国人口迁移》于1992年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该书涵盖了从先秦至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然而,对山西移民进行深入论述的专著仅有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六卷)中部分章节论述了明清山西移民,但对明清移民与山西戏曲的关系论述颇少。可贵的是,范玉春在《移民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专列章节,对“移民与明清时期地方剧种的形成”专门论述,遗憾的是此观点未能进行深入论述与研究。对明清移民与山西戏曲展开研究的还有一些相关论文,诸如复旦大学安介生的《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兼论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贡献》一文,认为山西移民自清代迁入归化土默特地区后,为当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使这一地区的风俗、戏剧、语言等富有浓郁的山西本土特征。朱振华、孙桂芸的《明清时期山西移民对戏曲艺术的影响》(载于《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6月)。认为明清时期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晋文化带到了迁徙地,并且将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山西戏曲艺术扩展到其他地区,促进了山西戏曲艺术的传播,并对其他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外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对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发展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其中就包含了大量

明清山西移民史的内容。

然而，把明清晋商、移民与山西戏曲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专著尚不多见。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是指从事本研究必须遵循和采用的一些基本方法。“晋商、移民与戏曲”的研究不仅要运用调查法、信息法与文献研究法，还需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文化传播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与论述。

文化传播学方法。文化传播学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等人创立的理论流派。它强调社会交往和接触对文化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的影响。文化传播的媒介多种多样，然而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明清时期，山西戏曲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人口的迁移，因而移民是明清山西戏曲传播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

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晋商、移民和山西戏曲展开研究，需要对晋商与移民的行走路线、发展沿革，以及山西戏曲的传播流布范围等方面展开研究，而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空间分布的变化本身即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对本题目展开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

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是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诸文化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形成条件的科学，其基本出发点是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尤其是地理环境差异对文化地理分异的作用。山西戏曲随着晋商以及移民的流动，不自觉地由山西传播与分布到全国各个

地方，因而有“商路即戏路”的说法，因而对明清时期的山西戏曲展开研究，也需要使用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语言学的方法。晋商与移民所到之处，戏曲的发展与传播必然要受到当地语言及民俗的影响，因而运用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方法，从现实语言材料出发，以今证古，可以了解山西戏曲传播与发展的历史。

社会学的方法。晋商、移民对山西戏曲的传播和流布并不总能完整无疑地保存在历史文献资料中，而是大量保留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等口碑材料中。因而，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采访、调查，可以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文献及口碑资料，以便对明清时期山西戏曲的传播流布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

因而，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经济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传播学、语言学的观点审视明清山西戏曲的发展，力图体现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性。而且，首次引入移民的视角，以晋商与移民作为视角研究山西戏曲流布与演变的特征，并对晋商、移民与戏曲的诸多问题展开思考，以求论著具有前瞻性与实用性。